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观恒丛书

经略译丛 施展 / 主编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俾斯麦

凡人与政治家

[英]A.J.P.泰勒 / 著 陈丹 陈露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观恒丛书

经略译丛

俾斯麦： 凡人与政治家

[英]A.J.P.泰勒 / 著 陈丹 陈露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观恒丛书”总序

《易经》“观”卦，坤下巽上，其彖辞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朱子注曰：“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意谓治国当秉德性，应天道，一本自然，如顺谷风行。

然则，天道为何？孔子曰：“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故知，天道流行，然天道亦有恒。

《易经》“恒”卦，巽下震上，其彖辞曰：“刚上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意谓观恒而可知天道，此为政之本。

然则，何以治本？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

爱与敬，中华为政之本，然西人亦不悖此道。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3-44）

中华大道隆兴数千载，惜乎近世国运日蹙，然晚清士人清醒者亦所在多有。其慨叹天道流转，“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

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日记》（三）]

天道流转不忒，中国再度勃兴。奈何今下世风浇漓，人心不古；为政之道，多所毁弃。少有惕励观恒之沉潜，惟闻“大国崛起”之亢奋。《阿旁宫赋》可为警醒当下之盛世危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观恒行道，先当有郁郁之文。本丛书拟集中外经略之书，议古今为政之道，论在中国，旨在天下，以为一快。

是为序。

“经略译丛”序言

“经略”一词，最早出于《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西晋杜预注之曰：“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

由此可知，在古代，经略者必定是以天下为一轂，以四海为一家的。对于古代中华帝国是如此，对于古代西方帝国也没有差别——古代罗马帝国一统天下自不必说，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从理念上来说也是一个旨向全世界的普遍帝国。之所以如此，概因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是一种文明的道德理念的承载者，不拘限于特定领土，亦不拘限于特定人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进入中世纪晚期，西方开始经历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名义上大一统、至此已延续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系由种种复杂的封建契约关系捏合在一起，其各个封邦彼此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在封邦夹缝中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治城市。这些因素缓慢但坚定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法权治理的初萌。百衲布般的帝国无法整合这些新事物，一些强大的封建王公便在与市民阶层结盟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领土国家的建立。这些新的政治体在理念上来说仍然是帝国的附庸，亦要受到天主教会的挟制，其作为绝对自立的事物无法获得一般认可。于是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对这种独立于帝国与宗教之外的，对应于特定的领土以及特定

的人民，高度世俗化的全新政治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论证。该种组织形式就是现代国家。他们的论证与强大王公的需求一拍即合，现代国家的质料与形式便全面地出现了，政界与学界的沟通与联动，是一种区别于帝国的、目标有限的“经略”。所以，“国家”（Nation-State）是一种西方特殊性的产物，相当程度上也是人为的产物，而并非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形式——反倒部落和帝国才是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形式。西方建立了“国家”之后，开始对外扩张，并因此而将“国家”的理念传播到非西方地区，及至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在世界上普遍建立了“国家”，以致我们通常都以为“国家”才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常态，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

该一误解对国人带来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我们经常以为“国家”无需维持而自然存在，以为天灾、人祸、战争、动乱，都不会取消“国家”作为一个自在主体的地位，所以，就政治问题而言我们只需关注政体。若持此种认识，实不足与论“经略”。须知，从普遍帝国当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是近代政治当中最为基础的东西，其作为一个人造物恰是需要最高级的政治技巧来卫护的。政体的改革与变迁不过是二阶政治问题，若离开了“国家”这个一阶政治问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国家”，这是最大的“政治”！对于“国家”的经略，方为现代世界最为根本的经略！

对于何谓国家，国人尚多懵懂；对于国家该当如何经略，则更是需要深刻的反思。西方各国近代以来的大政治家，莫不是政治实践当中“国家学”的绝顶高手，看看他们是如何经略国家的，对于我们必会大有启发。非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深谙现代经略之道的政治家，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自己的国家也在世界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些人的作为，也必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西方的国家理论我国已多有译介，但是对于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大政治家们的

经略之道，则仍是关注有限。

虑及于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经略译丛”，选辑的标准或是近代以来国外重要的政治家，其本人的著作，体裁不论；或者是对近代某些大国之总体战略筹谋的析解书籍。虽然所选书籍体裁不尽一致，但有一个旨向是一致的，那就是，选辑之书要能反映出作为个人之大政治家或作为整体之大国的政治思考与实践，从中能够读出其经略之苦心，以为我们的镜鉴。希望本套丛书的翻译出版能够在帮助国人理解现代国家经略这一问题上有所助益。

目 录

“观恒丛书”总序	(1)
“经略译丛”序言	(1)
第一章 童年及成人	(1)
第二章 外交官	(22)
第三章 普鲁士的首相	(40)
第四章 奥地利的失败	(55)
第五章 北德意志联邦	(75)
第六章 处于自由主义时代的德意志帝国	(102)
第七章 转变期	(134)
第八章 保守的宰相	(167)
第九章 倒台	(201)
第十章 去世以及死后	(221)
参考书目	(240)
译名表	(245)

第一章 童年及成人

1815年4月1日，奥托·冯·俾斯麦出生于位于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区的申豪森。出生的时间和地点都暗示了他整个一生的生活方式。位于易北河正东方的申豪森，此时正处于典型的容克地主生活状态：有着一些绵羊和城堡、麦子和甜菜地，后面是森林作为背景。生活似乎遵循着传统的旋律，远离现代社会。然而，如果俾斯麦早两年出生，由杰罗姆·波拿巴统治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版图可能只能刚刚跨过河岸。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占据了申豪森；法国革命思想吹过这片土地的边缘。真正的容克地主住在遥远的东部，在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这些容克地主是普鲁士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是以自己的出身为傲的贵族，但是自己经营着自己的产业，并经常需要参与公共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收入。他们以嫉妒的目光看待那些有着世界文化并掌握政府最高统治职务的高级贵族。在英国的乡村贵族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他们对于辉格党资本家存在着保守的偏见和无尽的仇恨；但是容克地主更接近土地，经常自己挤奶牛并在最近的市场出售羊毛，他们与更富有的农场主的区别往往仅仅在于他们具有悠久的姓氏。

申豪森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但是现代世界之风已经在其四周吹起。尽管俾斯麦出生于易北河的容克地主所在地，但他是那种经常以理解或是同情的目光审视这片土地的容克地主。他的出生日期同样非常重要。两个星期之前，拿破仑已经到达巴黎开

始了他百日王朝的最后冒险。旧的秩序几乎被摧毁。俾斯麦尽管表现出异常的镇静，但时常会感受到革命潮流已经试图吞噬申豪森的传统生活。他所在的普鲁士王国已经再次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后来几乎被拿破仑所摧毁。普鲁士的政治家们担心同样的命运会再次到来。这成为他们的座右铭：“要么更强，要么更弱。”这根本不是自信的保守主义的基础。

申豪森的地理位置同样塑造了俾斯麦的性格和政治主张。它恰恰位于完全被新教徒占据的德国北部。俾斯麦从未将南德视为真正的德国人，尤其当他们还是罗马天主教徒的时候。同时申豪森距海很遥远。它的居民将柏林视为他们的首都；因而俾斯麦后来与汉堡建立的联系是相当虚假的。如果德国注定是要扩张的，他宁愿德国向海边发展而不是向多瑙河进军；尽管二者对他来说都很陌生。其后塑造普鲁士历史的东扩运动，对他来说是同样遥远的事情。与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不同的是，在他的农民当中，从未有过一个波兰人。由于个人经历的原因，他所谴责的波兰人是有知识的革命分子，而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工人；正是他们使得俾斯麦在政治中不喜欢知识分子。

在他的家族遗传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矛盾。他的父亲费迪南德是一个典型的容克地主，源自于一个如霍亨索伦王族般古老的家族——“任何一个施瓦本的家族都比不上我的家族”，俾斯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申豪森自身则代表了他们的耻辱；因为他们以他们原有家产为代价获得了它，他们的家产则为一直怀着觊觎之心的霍亨索伦王族的竞选人所攫取。尽管长期处于微贱的封建地位中，俾斯麦家族成员并没有为有所改变而做出努力。费迪南德甚至没有为国王而战斗过。在23岁的时候，他离开了普鲁士军队，错过了1806年的法普耶拿激战以及1813年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他没有能力去有效地管理那些散乱的资产，不知不觉而又无能为力地陷入了经济困顿之中。对于儿子来说，要想将这样一个

随遇而安、头脑不好、体格庞大的父亲变成一个英雄，表明所有的东西都是普鲁士历史中最好的，这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母亲威赫米娜则有着不同的特点。她的家族——门肯，是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官僚家族，并不是贵族土地所有者。家族中的有些成员当过大学教授。她的父亲是普鲁士政府的雇员，曾经被腓特烈大帝嘉奖过，后来掌握了所有内政事务的控制权。他的改革以及激进的批判精神使他被指责为激进共和主义。威赫米娜是城里的孩子，喜欢呆在柏林家中的会客室。她思维敏锐并且无休止地徜徉于斯韦登伯格和梅斯梅尔之间。一会儿她在讨论政治自由主义的最新著作，一会儿又在涉猎唯心论者的试验。16岁嫁给了费迪南德·冯·俾斯麦，她对自己严肃的丈夫和乡村式生活都不感兴趣。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要获得她不能获得的知识分子式的生活。她说，她唯一的野心就是“让某个孩子长大后能够比她更深入地钻研世界思想”。

她给孩子们严厉的管教。她鞭策着他们；从来不显示对他们的爱。奥托，这个小一点儿子，继承了她的聪明才智。但是他并不为此而感激。他希望从她那里得到爱而不是思想；而且因为她不如自己那样尊敬父亲而憎恶她。儿子爱自己的母亲并希望父亲不要碍事，这是心理学的常识。这样的结果更加有趣、更加令人思考：一个像母亲的儿子并不喜欢母亲的性格和价值观。他力图将自己变成与自身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的父亲而努力，他可能会变成精神病或者天才。俾斯麦二者都是。他是一个聪明且老于世故的母亲的聪明且老于世故的儿子，并将自己的整个一生装扮成如同严肃且质朴的父亲一样。

他的相貌也表明了这点。他是一个高大的人，并且由于他不停地过度吃喝而变得更加魁梧。他走路僵硬，有着世袭官员式的笔直姿态。然而他有一个小且灵活的脑袋；一双艺术家式的精巧的手；而且当他说话的时候，本以为他的声音会是深沉有力的，

但实际却是细小而尖声的，像是假音，这完全是一个学术界人士的声音而不是一个行动家的声音。他留给世人的形象也是不一致的。在历史上，除了留有浓密的小胡子外，他的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但是实际上，在他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留有满脸的胡须；而这就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此时胡须成为欧洲大陆上盛行的浪漫主义运动（如果不是激进主义运动）的标志。至于剃须刀的使用，正如其他物品一样，俾斯麦有时候模仿梅特涅，有时则模仿马克思。他除了具有容克地主的风度外，他还有女性的敏感，可以极度迅速地对他人的情绪作出反应，或者甚至预测他人的情绪。他交谈时的魅力可以迷惑沙皇、皇后以及革命领袖。然而他的政治技巧来自于长时间的独自沉思，而不是来自于和他人的讨论。实际上，他从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交换思想。他发出命令，或者极少情况下亲自执行；他从不与人合作。在充满冲突的生命中，他发现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他曾经说过：“浮士德抱怨自己有两个灵魂。我有一个争吵不休的群众团体。他们组成一个共和政体。”当有人问他是否真是铁血宰相时，他回答说：“远远不是那样。我非常敏感，所以自我控制总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任务，现在仍旧如此。”他控制着自己执行一整套政策或者行动。他的朋友凯泽林谈到他关于宗教的看法时说：“疑虑不能靠斗争而征服，而是靠英雄般的意志熄灭。”

他感到自己总是不合时宜，非常孤寂，对于周围来说是个陌生人。“我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特质，任何对我来说非常适宜的地方，一旦我到达之后，就会发现它是沉闷而乏味的。”他憎恨由他母亲介绍给他的柏林文化圈，在1848年他曾对一个开明的政治家说：“我是一个容克地主，具备容克地主的优秀品质。”但是，当他以容克地主的身份生活，管理自己的财产的时候，他过着自己生命中最悲惨的一段生活；而当他以宰相的身份退休回到自己深爱的土地时，只有当政府公文继续涌向他的时候，他才是高兴的。

他有二十八年的时间处于最高权位，不停地宣称自己要辞职；然而没有人如此拙劣地辞职，也没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地争取复职。他贬低作家和文人；然而只有路德、歌德和他并列为德国散文大师。他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才能感到快乐；爱他的妻子，给孩子们他自己所未获得的被自己母亲剥夺的爱。他在年老的时候说他最大的财富是“上帝没有从我身边夺去任何一个孩子的生命”。然而，因为私人间的不和，他摧毁了他所珍爱的大儿子的快乐；在一个漂亮女孩的陪同下，远离妻子度过一个漫长的假期之后，他没觉得有任何问题；而且由于他如此自我主义，他甚至向自己的妻子吹嘘那个女孩的魅力和娇美容颜。他声称自己时而服务于普鲁士国王，时而服务于德国，时而服务于上帝。所有的这三个都是他为自己的意愿寻找的借口；当他们不能满足自己的目的时，他会无情地背叛他们。他也许曾就奥利弗·克伦威尔说过（他们二人非常相似）：“他走得非常远，而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走到那里”。这位年轻的容克地主没有想到他会在全民选举的基础上统一德国；这位三次战争的制造者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欧洲和平的坚强支柱。

俾斯麦并没有被培养成为容克地主，尽管他在其后的生活中经常强调自己容克地主的特点。他出生在波美拉尼亚的克尼珀霍夫的小小庄园里，不久便举家迁移了。在这个庄园里，有一座没有任何装饰的小房子，还有艰苦的田间劳作。与英国的贵族所不同的是，容克地主不靠地租生存。他们自己在田间劳作，他们的佃农实际上是农业劳工，他们并没有耕作自己的土地。俾斯麦度过的这种田园生活仅仅持续到七岁。然后他的母亲在柏林建置家庭，这显然是出于她自己的喜好，但是表面上是为了将她的儿子送到首都的学校上学。从乡村迁出来使得俾斯麦长期对自己的母亲不满。而她为他选择的教育是第二个不满因素。一个容克地主的儿子通常是进入军官学校，然后加入骑兵团，即便他并非注定

要一辈子从军。然而威赫米娜认为她的孩子必须受到知识教育，这才是适合伟大的门肯宗族的子孙去做的事情；俾斯麦进入柏林当时最好的语法学校，在那里，他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相处在一起。他的母亲重新建立起与宫廷的联系；而俾斯麦则有着特别的权利，他与年轻的霍亨索伦王室成员保持亲密的关系。这对于他以后的职业生涯是相当有用的。尽管他喜欢独处，他还是经常处于皇室圈子之中，并被当作这个家庭的一分子。

启蒙精神仍旧掌控着普鲁士的教育；而俾斯麦离开学校的时候，“是一个泛神论者（如果不是一个共和论者的话），相信共和政体是最理想的政府形态”。他的母亲曾经再次将自己的知识要求强加于他，把他送出普鲁士到位于汉诺威的哥廷根大学，那是当时最伟大的文化中心。俾斯麦最开始走的是激进路线。他在行动和思想上都违抗着大学的纪律。而且，他加入了“青年协会”，这是一个试图继承解放战争革命精神的学生联盟组织。不久他就转向另一边了。在柏林的宫廷圈中表现为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是一件事情；接受这些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没有教养的学生作为自己的同辈则是另外一件事情。人际关系改变俾斯麦的政治见解，这在他其后的生活中经常发生。他突然发现自己血统的高贵并加入了一个贵族学生团体。他仍旧过着杂乱的生活。他喝很多酒；有很多充满激情的绯闻；像年青时的迪斯雷利一样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他时刻准备着与人决斗，唯一一次受伤他声称是因为决斗不公平——即使三十年后他仍旧愤愤不平地这样声称。三个学期之后，债务将他赶回柏林，在那里他可以住在家里；他进入第二学年继续学习。在1835年5月，此时他年仅20岁，他勉强通过考试从而可以进入普鲁士市政服务机构。

尽管俾斯麦绝对不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那些在大学的日子里还是留下了它们的印迹。尽管他吹嘘自己无所事事，但他的阅读十分广泛，虽然比起他应该读的法律书来说，他读了更多的历史类书籍。

他喜欢席勒，崇拜歌德，并将莎士比亚、拜伦列于二者之上，从而钟爱浪漫主义运动。斯科特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浪漫主义和历史在他那里以很好的比例进行了溶合。俾斯麦对经典的学习是不足的；他的科学知识几乎不存在。他演讲当中提及的历史，全部都是宗教改革后三百年的历史；他对达尔文学说的回应也仅仅限于从报纸当中获取的东西。哲学从未引起他的兴趣；他是少数几个能逃离黑格尔影响的德国人之一。对俾斯麦来说，人往往比书本更重要；在大学的，他仅仅结下两个维系一生的友谊，都是和男人，而且是同他一样处于奇怪环境中且如鱼离水般的人。亚历山大·凯泽林是一个来自波罗的海的德国男爵，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博物学者。约翰·马特利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家，后来成为研究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俾斯麦仅仅相信这两个外人。三人之间的情感从未消磨，尽管经历过长期的分离。四十年后，俾斯麦仍旧激情不减地给“亲爱的老约翰”写信；即使他成为铁血宰相后，他仍愿意抛开职务的顾虑和尊严去迎接马特利。凯泽林的感情较不外露；但他也是忠诚的。在俾斯麦从政坛失势后，凯泽林尽管已经年近八十，仍旧放弃自己在波罗的海的修养去安慰他的老朋友；而他的到访给俾斯麦带来一份持久的平静而快乐的体验。

俾斯麦渐渐长大，进入德国的反动（reaction）年代。在拿破仑帝国的暴风雨洗礼之后，德国紧接着进入了“平静岁月”。德国被划分为 39 个邦，它们是经历拿破仑式重建后的幸存者。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十分小；有六个稍大一点；其中，有两个邦——奥地利和普鲁士处于支配地位。位于维也纳的国会把这些邦连接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该国会本来是要解决内部纷争并以联合力量抗击外部侵略。但实际上，它唯一的职能却是镇压德国的自由运动；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它也是非常无效的。在联盟之中，奥地利处于领导地位。她拥有更多的历史威望——皇帝是统治者，而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梅特涅是宰相。她有着大国的军队，据说可以挑战法国的军队，正

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她常常做的那样——尽管都不成功。然而奥地利帝国在衰落——它的财政在动摇，它的管理呆板而过时，它的存在在受到了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威胁。

普鲁士受到了拿破仑更严重的损坏；对此的记忆使得其后她的政策完全遵循奥地利的保守路线。她几乎不被计入大国之列。在1815年，只有一千万普鲁士人，而当时则有三千万法国人，奥皇统治下则有几乎三千万臣民。普鲁士的军队也没有什么威信。其他强国建立在由抽签选中的征募兵的基础之上，这些征募兵需要服役15或20年。普鲁士为了弥补人力资源方面的弱势地位，给其臣民中的大部分或全部以为期三年的训练，然后在战争时期再召集起来。虽然这种方式是以后所有军事发展的必然模式，但是它遭到当时专家的鄙视，认为其仅仅能提供民兵式的战斗力量。腓特烈·威廉三世（其统治持续到1840年）胆小而没有想象力，他急切地跟随梅特涅以求得庇护。在解放战争的狂潮之中，他向其人民许诺要建立一个宪政国家。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反悔而没有履行他的诺言。最终只是答应在没有获得某种形式的人民议会（popular assembly）的同意时，普鲁士不得寻求任何新的贷款。普鲁士的八个省都有在一定阶级基础之上选举产生的议会，但是它们只具有很少的实际职能。出于纯然实际的种种目的，普鲁士继续由一个人数范围很小的官僚体制掌控，这个官僚系统比欧洲任何一个官僚系统都要有效和忠诚，但它极端脱离民众。

德国主要仍是处在农村状态，柏林则仅仅是一个过度发展的军事要塞。当法国控制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以后，他们开始开采鲁尔区的煤矿。但是德国的少数大资本家则在莱茵河要道上从事商业和银行业来获得财富。普鲁士于1834年建立起来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已经废除了大部分的内部关税，但是贸易规模依然不大——主要以德国的羊毛和小麦来进口英国的工业品。尽管经济处于停滞，德国的知识界却异常活跃。德国的大学是当时欧洲最

好的大学。当女皇的丈夫尝试改革牛津和剑桥之时——一定程度上没有成效——他无疑是以德国的大学作为其模仿的范本的。大部分学生受到了朦胧的激进主义的影响。即使俾斯麦也不例外。他嘲笑官僚阶层，并向凯泽林说：“一部宪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全世界赢得尊敬的道路。”与大部分的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普鲁士要靠自由主义来统治德国而不是依靠她的武力。

他在市政部门的短暂生涯是不成功的。1836年，在波茨坦为期几个星期的训练之后，他被送往位于普鲁士莱茵兰的亚琛。普鲁士在1815年刚刚获得这个地区，以作为被俄罗斯强取的波兰土地的补偿。那里的居民对于普鲁士没有任何感情。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多受到过法国自由主义的影响，不能容忍保守主义。他们被纳入法国近20年时间，直到1900年仍旧保留拿破仑法典。普鲁士的政府官员受到鄙视，不被爱戴。但是俾斯麦并没有使自己纠缠于当地的居民。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在去往更时髦的旅游胜地的途中穿过亚琛；而俾斯麦不顾自己的公职和这些富有者混在一起。他幻想着自己和一个又一个的英国富有女子谈恋爱，声称和克利夫兰的公爵的侄女有过交往。不久他又宣称自己和来自莱斯特的年轻女士订婚。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他同未婚妻一起穿越德国。他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故而将假期延长到三个月。这件事情最后没有任何结果，他仅仅获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太高傲了，以至于不能去做要求原谅而重新回到亚琛这样的事情。当其成为宰相后，对一位犯了这样的过失的下属，俾斯麦将作何评论——这很容易猜测。对于种种投诉，俾斯麦只回应说：“他绝不想向政府汇报自己的私人关系。”

他发现了一个躲避亚琛的简单方法。受中等教育的普鲁士人需要在军队作为军官服役一年；俾斯麦也要如此。他想以肌肉虚弱为理由来试图逃脱：“我告诉他们当我举起右手的时候我会感到疼痛。”这种理由没有起作用，俾斯麦加入了位于波茨坦的卫戍部